

# 两通石碑的故事

潘晓 赵丽娟

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类储存信息的方式从古代的石刻、兽皮、竹简、纸张,到现代的磁带、光盘、硬盘等等,不断迭代。然而,即便科技如何发达,目前信息留存最久的载体仍是把字刻在石头上。从古至今,中国人记载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,都会以碑刻记载。就如一百多年前,胶州知州李翼清给百姓修了一通石碑,他离开胶州之后,百姓也给他修了一通石碑。

《增修胶志》记载,李翼清(1829—1894年),字彦之,清江苏武进(今江苏常州市)人。光绪元年(1875年)二月至光绪七年任胶州知州,光绪七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五月复任。在胶州任职期间,他整饬风化、创新社会治理、建立教育长效机制,具有远见卓识,因治理有方,深得百姓爱戴。

光绪元年,兵灾之后的胶州尚未恢复元气,这一年恰逢李翼清来胶州任职。他关心民间疾苦,首先从整饬风化做起。到任伊始就告诉百姓,凡是有孝顺的男子、刚烈的女性、有节操的妇女名声被埋没的情况,都要去认真落实事情真伪,情况属实就进行表彰。

任职期间,李翼清发现胶州的义塾已经毁于战火,存在当铺中用于设立书院的一万多两银子的当票也被毁了一半,而剩余的部分又被州署拿去当作兵粮团费以及修圩筑城费用,所

以胶西、灵山两书院教育经费极为短缺,从而导致报考人数寥寥。李翼清就重新修缮东隅、西隅、南隅、北隅义塾四处,新添设灵山卫义塾、薛家岛义塾、七级义塾三处,还增加了胶西、灵山两书院的经费和乡试、会试路费。光绪三年五月,商人张健封慷慨捐助京钱六千,李翼清把其中两千作为士子乡试路费,息本一千作为士子会试路费,息本三千作为书院经费。按照一分二厘的利息放入当铺中,并且规定这些息本无论何种公事都不准挪用。为了确保这项政策保持下去,李翼清特地立了一通石碑,将其记录下来。

李翼清认为,对于学子来说,必须摆脱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状况,每个读书人都应该了解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。为此,李翼清聘请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,注重培养学子经世致用的才能。他规定把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一门课程,希望多一个读书之人就多一个世事洞明的人,为地方社会发展服务。

李翼清自己捐库平银五百两,京钱一千,利息和本金合起来每年可再得利息,这些利息用来支付老师的酬金和城乡七处义塾的费用,不够的部分由李翼清捐献养廉银填补上。李翼清通过刻文立碑的方式,希望能够把这项政策传承下去,让继任的知州可以效法。

捻军攻打胶州之后,在官员们倡

导下修建了围墙。但是多年过去了,当时修建的城墙都已毁坏渐渐坍塌,于是李翼清率领官绅百姓进行修缮,防止意外发生。

光绪二年春,李翼清奉命在沿海种树作为屏障。胶州海岸长,为完成任务,李翼清夜以继日,勤于政事公务,细心认真规划,顺利完成了沿海种树数十万这一牵绊繁多的巨大工程,还因此得到了上级嘉奖,相邻州县也纷纷效仿他的做法。

这年春天,粮食短缺,谷物价格飞涨,商人们哄抬物价、囤积居奇,加上海上航道的商人认为税太重,不往胶州运送粮食。李翼清了解其中的原因后,下令马上平抑物价,又上书免除海上航道商人的粮食税,促进商人往胶州运送粮食。李翼清通过平抑物价和减免粮食税,使百姓获得了救济。

同年四月,蝗灾又起,李翼清号召民众捕捉蝗虫。为鼓励民众捕捉蝗虫,李翼清规定,官府把民众捕捉到的蝗虫购买下来,这样百姓捕捉蝗虫的积极性大大提升,蝗虫也很快被消灭。蝗虫虽然被消灭掉,但是因为蝗灾造成麦子歉收,强盗蠢蠢欲动,有的甚至聚集起来抢夺粮食。李翼清把他们的首领绳之以法,老百姓得到安定。

光绪五年,李翼清发现胶州发生水灾都是因为云溪河、墨水河淤塞导致,就筹集巨款疏浚,从此改变了水灾频发的状况。



据《山东通志》记载,李翼清历任山东肥城、胶州等知县、知州,兖州同知,光绪十四年(1888年)升东昌府(山东聊城)知府,山东候补道。任职期间,他始终勤勉为民,德政泽被百姓,受到广泛称赞,被称为“能吏”。《增修胶志》记载:后来百姓感念他的德政,为他立“李公德政碑”。

两通石碑,一个故事,记载了“政之所要,在乎民心”的政德之本,与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的民心所向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)

## 古代调处制度及启示

朱会良

调处制度是古代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,作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,调处制度延续几千年来的“无讼”法律观念,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蕴意。所谓“调处”,指的是在第三人的居中斡旋下,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等达成和解,不再提起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。古代调处主要分为官府调处和民间调处(包括乡里调处、宗族调处等)。从先秦到明清,古代调处制度在处理社会纠纷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(一)

我国的调处息讼价值观萌发于五帝时期,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了舜调处“历山之农者侵畔”“河滨之渔者争坵”等部落内部纠纷的传说。调处制度约形成于西周,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了周文王调处诸侯之间争端的故事。《周礼·地官·司徒》记载官府中就设有“调人”一职,“调人”是从事调处的中间人,主要职责是“掌司万民之难。而谐和之”。

秦朝由乡级政权办事人员中的“三老”(即农老、工老、商老),掌管道德教化,调处民间纠纷,评断曲直。

汉代调处息讼制度逐渐完善,县以下的乡、亭、里设夫,乡“嗇夫”承担“职听讼”和“收赋税”两项职责,其中“职听讼”包含调处民间纠纷的职责。

自秦汉以降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,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的办案原则。民事纠纷诉至官府后,官吏多主张调处息讼,甚至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通过民间调处机制解决。

隋唐时期的乡正、里正和村正,负责调处民事纠纷,处理不了的纠纷则上送县衙。不过,即便是在县衙,官吏首先选择的纠纷处理方式也是调处。

两宋时期是调处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,调处制度被引入司法程序,劝解息讼成为地方官吏的法定职责。对于民间诉讼,司法官吏一般先调处息讼,《宋史·陆九渊传》载:“民有诉者,无早暮皆得造于庭……即为酌情决之,而多所劝释。其有涉人伦者,使自毁其状,以厚风俗。唯不可训者,始置之法。”即有民众告诉时,司法官多劝解调处结案,只有教化不行、调处未果时,才置之于法。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亦记载:“遇亲戚骨肉之讼,多是面加开谕,往往幡然而改,各从和会而去。如卑幼诉分产不平,固当以法断,亦须先谕尊长,自行从公均分。”因此,调处又称为“和对”。

(二)

元代法律正式确立了民事调处制度,形成了“调处”和“息讼”的系统法律。元代还为调处取了一个特殊的名称——“告拦”。《元典章·刑部·诉讼》中规定,通过审判官调处达成和解而再次起诉的案件,不允许有司再行受理。这就使调处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既判力和法律约束力。此外,还赋予宗族、乡党等民间纠纷调处权,宗族调处和乡约调处成为最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。元代在基层乡里设社,社长负责对邻里间的婚姻、家财、田宅、债负等民事纠纷及过失造成的轻微伤害纠纷进行调处,调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,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样的事实和理由

提起诉讼。

明清时期,调处制度更加完备。明代以儒家的“无讼”观念为社会管理的指导理念,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。明太祖钦颁的《教民榜文》中规定:“民间户婚、田土、斗殴、相争一切小事,不许辄便告官,务要经由本管里甲、老人理断。若不经由者,不问虚实,先将告人杖断六十,仍发回里甲、老人理断。”即不经调处而起诉者,按“越诉”处理。只有经调处不能化解矛盾的,才能向官府起诉。正如松江知府赵豫所言:“和易近民,凡有词讼,属老人之公正者剖断。有忿争不已者,则已为之和解。”《大明律集解附例》明确规定:“凡民间应有词状,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。”明代在乡、里设立以张贴榜文、申明教化的申明亭,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,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在申明亭调处。明代后期,各地推行“乡约”制度,一些乡规民约也对调处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。

清承明制,在清代法律中,调处总是处于被优先考虑的地位。康熙《圣谕十六条》中规定“和乡党以息争讼”“明礼让以厚风俗”,这是清代调处制度应坚持的重要原则。清代调处主要有州县调处和民间调处两种方式。清代还将州县调处率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,在州县官的主持下,民事纠纷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。清代地方官员对民事案件的调处可谓不遗余力,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调处适用范围被不适当地扩大。民间调处,主要包括宗族调处和乡邻调处,族内纠纷先由族长或乡邻调处,不得轻易告官。县、乡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保甲

制,十户立一牌,设牌头;十牌立一甲,设甲头;十甲立一保,设保正。牌头、甲头、保正的职权包括治安、户籍、课税及调处民间纠纷。

(三)

古代的调处制度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,主要有以下特征:

一是在思想源流上存在“情理”性。法律与道德伦理是相辅相成的,法与情并非泾渭分明。古代调处制度的依据,不仅包括国家律令,还包括家法族规、礼俗、情理、习惯等。我国古代崇尚儒家文化,其立法思想亦主张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和睦无争、宽容谦让,调处无讼、“以德去刑”是国家治理的上策。

二是在适用范围上具有限定性。主要适用于民事纠纷(如户婚、田土、房产等)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,“十恶”“强盗”和杀人等重大的刑事案件不适用调处。

三是在运用方式上具有灵活性。古代的调处是灵活多样的,不拘泥于形式,可以选择官府调处或民间调处,给了当事人选择权;不受制于地点,既可以在当事人的家中,也可以在官府专门设立的场所进行调处,以便利当事人,如明初就设有申明亭等用于调处的场所。

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、治已病,更要抓前端、治未病,应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,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。这既能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诉累,更能有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;摘自《人民法院报》)